

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集

胡惠林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集

胡惠林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惠林集 / 胡惠林著. —昆明: 云南
大学出版社, 2015
(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集)
ISBN 978-7-5482-2355-9

I. ①胡… II. ①胡… III. ①文化产业—中国—文集
IV. ①G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46362号

策划编辑: 陈 曦
责任编辑: 李 红
装帧设计: 郑明娟

胡惠林集

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集

胡惠林
著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422千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2355-9

定 价: 86.00元

社 址: 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集” 编委会

主 编 施惟达

编 委 李 炎 周永坤

林 艺 郑 海

作者简介



胡惠林，文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科学部委员，国家行政学院、中国海洋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河南、重庆、山西、山东等省市文化建设决策咨询专家，南京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研究生

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文化战略与管理、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经济学等研究。著有《中国国家文化安全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论》《文化经济学》《文化政策学》《文化产业学》《发展文化产业学——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研究》《胡惠林论文化产业》等，《中国文化产业评论》（CSSCI）主编，《辞海》第7版文化分科主编。先后主持教育部重大课题、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及国家和省部级基金项目多项。

出版前言

我国的文化产业萌芽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那时人们刚刚从“十年浩劫”的文化沙漠中走出来，被长期压抑的文化需求在宽松的环境中得到初步释放。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文化市场也逐渐成长起来。与此同时，复制与传播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为文化产品的大规模生产与消费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文化产业破土而出。而到 21 世纪初，由于我国加入 WTO 后对开放国内文化市场的承诺，使文化产业的发展更有了新的挑战与机遇。2000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与管理，推动文化产业发展”；2001 年 3 月，发展文化产业正式被纳入全国“十五”规划纲要。从此，中国的文化产业走出萌芽期，进入起步期。2003 年，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开启，催动文化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10 多年来，文化产业业态逐步完备，新兴产业业态不断产生，法人单位与从业人员快速增长，文化产业增加值均高于同期 GDP 年均增长速度。即使曾遭遇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文化产业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4 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为 3340 亿元，至 2013 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 21351 亿元。今天的文化产业，更随着国家的战略谋划，逐渐广泛、迅速地融入互联网，向着特色化、纵深化和国际化转型升级，不断创新发展。

毋庸置疑，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驱动作用是相当明显的。但是，在政策驱动的过程中，理论的探索与提升仍然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十多年来，一批学者从文化学、文

艺学、艺术学、美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转入对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与探索，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差异辨析，文化产业的范围和门类划分，文化产业的统计指标体系确立，到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发展规划、文化产业政策制定、文化体制改革，到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区域性发展等，结合理论与实践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还有一些高层管理者，出于工作的需要，站在全局的角度，对一些涉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以指导实践。这些理论研究与探讨，有的是对文化产业实践的总结与提升，有的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设计与期许，有的切实反映了文化产业的现实状态，也有的与现实还有一段距离。而正是在不断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我国的文化产业政策逐步地丰富和完善起来，并推动文化产业发展。这些成果无疑都从一个侧面记录下了我国文化产业曾经走过的历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国家的文化产业十多年来风风雨雨的发展轨迹。

本丛书收取了十位全国有影响的文化产业理论研究者及学者型的高层管理者十多年来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成果，虽然不一定全面，但具有代表性。而正如不能说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成熟，已经成为支柱性产业，我们的理论研究也同样不能说已经成熟完善，有成熟的研究方法与学科规范，形成自身的学术体系。本丛书希望通过此前一阶段理论成果的集中回顾，使广大读者和相关从业人员能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梳理历史，更好地把握与理解现实，从而更自觉地创造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未来。

“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集”编委会

2015年5月

前言：文化产业话语空间的中国建构

理论、政策与战略构成了自 1998 年以来文化产业中国建构的空间，而这空间又包括话语空间和实践空间，文化产业规划成为它最为亮丽的景观。一切围绕文化产业的中国话题和言说，没有一个不是以此为中心的；包括所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在内的所有关于中国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无不是这一基本结构的表现。或者说，正是这一基本结构建构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结构形态与秩序，从而形成了近 20 年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路径和基本特征。

中国文化产业话语空间的建构是从 20 世纪末开始的。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提出挑战了世界各大国和大国集团的战略底线。中国改革开放必须有效地解决自我改革动力不足的问题。用开放促改革，成为当时中国战略界的一致主张。“复关”谈判的失败使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中国融入现代世界体系、克服自身所难以克服的“改革困境”的关键。文化产业问题是在中国“入世”的谈判进程中涉及文化市场准入时被提出来的，这是美国人对中国的挑战，也是美国在同其他国家入世谈判过程中屡试不爽的战略手段。中国是在许多方面都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文化市场开放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比经济领域里的开放更具有根本战略意义的挑战，文化产业是它的核心部位。中国有文化产业，也有文化市场。但是，在意识形态思维下，中国一直忽视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的建设。开放倒逼改革；自古华山一条路，不进则退。于是，“应对挑战”成为在此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共同目标和研究思维。正是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特殊的战略需求，建构了文化产业中国研究的思维取向——对策研究，理论、政策与战略便由此构成它的基本话语空间特征，并且一直

影响至今。也由此把中国文化产业学术研究和发 展道路与西方区别开来。这一基本特征也构成了我这十多年来文化产业学术研究的主要特征。收录于本书的十多篇论文，集中反映了我所走过的文化产业学术研究之路。

我的文化产业学术研究，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2009 年是它的分期年代。从 1998 年至 2008 年，我大致是以“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为核心命题，以文化产业发展为主要对象，以文化产业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为主要内容，把理论研究和对策与战略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融理论研究、政策分析和战略构想为一体的研究方法和话语结构，并由此建构一种文化产业学术研究的三维空间。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加入 WTO 后我国文化产业理论与政策》研究和《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 展策论》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我的文化产业研究的学术取向。2008 年下半年，在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同行的激烈竞争中，我获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08JZD0034）立项资助，使我有机会作为首席专家能比较系统地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从而开启了 2009 年之后的我的文化产业学术研究领域与研究议题的转变。虽然，理论、政策与战略依然构成了主要空间形态，但是，内容已经出现了较大的深入性转变。《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力量的发 展方向》是这一转变的标志。历史为这一转变提供了机会，创造了条件，全球性金融危机提出了全球性问题，也为开创新的研究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维视角，重新思考过去仿佛已经思考过的问题。中国文化产业战略力量的发 展方向在“后世贸”时代应该有自己全新的“文化产业发 展的中国新政”。如果说，入世后的中国文化产业发 展完全是处在一种疲于应对的状态的话，那么，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文化产业发 展提供了一个化被动为主动的千载难逢战略机遇。抓住这个战略机遇，适时地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为未来中国文化产业赢得更为广阔、自如的战略发 展空间创造条件刻不容缓。此后，我的关于“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的公共责任”“文化民权”“国

家文化治理”“文化产业数据话语权”“文化产业理性发展的尺度”等等一系列全新的命题与概念便是在这一基础上提出来的，既开始了我个人研究的崭新领域，也开辟了我国文化产业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的新的命题空间。2012年《国家文化治理：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维度》的发表是我的又一个标志，开始了从国家文化治理、元理论的角度寻找关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合理性。这是比政策与战略更为困难的研究。

据此，我把这前后两个研究时期发表的有代表性论文编成上编，下编是我承担的三个地方（温州、郑州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究，是一种具有实践性的关于中国文化产业话语空间建构的地方实验。这三个地方有一定的代表性。文化产业发展有它的共同规律，但重要的是要能够找到和发现这个地方文化产业发展的特殊性路径。关于学者在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中的身份和作用我有一个基本认识：规划属于决策范畴，是政府的事，学者的定位是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是研究，而不是越俎代庖。但在实践中，我发现我们有不少学者在这一点上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错把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当成文化产业发展的“创意策划”，以为出一两个“金点子”就是“创意”，甚至不惜走上前台，替政府操刀。于是，生产出千篇一律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己当作“策划师”，到地方上到处撒金豆子，指望点土成金。文化产业发展规划当然需要有创造性想象，当然需要创意和策划，文化产业学者也应该贡献自己的智慧。问题是，你所有这一切创意策划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地方是要发展这一种文化产业？并且是按照你规划的那个样子发展的呢？规划是不用回答这些问题的，但是规划的内容是以它们为依据的。规划应该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本身。可以允许有不好的研究成果，但绝对不应该有缺乏研究基础和建筑在没有研究基础上的规划。在这里，我向大家推荐一本在我看来是每一个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学者都应该认真拜读的书，即美国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写的《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我不揣浅陋，把自己做过的而且做得很认真的三个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

究报告收在本书之中，就是希望提供一个分析和批评的文本，一来有学者通过渠道获得了我当年的研究报告，并且在他自己的规划中也采用我的研究方法；二来，正值“十三五”规划又要开始了，我想，我们作为学者还是应该多做些“发展规划研究”，少做些“规划”，把“规划”还给政府去做。关于这一点思考，收入本书的《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可持续协调发展》一文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如是这样，我相信，建立在学术研究基础上的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研究，一定能产生许许多多丰硕的成果，并且真正通过我们学者的学术研究，为中国文化产业空间建构创造和提供极为丰富多彩的想象，而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理论、政策与战略研究在这样一个充满创造性的想象空间一定会获得不竭的生命动力！

胡惠林

2014年10月金秋于秦淮河畔南京艺术学院专家楼

目录

上 篇

- 003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
- 013 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策论
- 035 论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制度创新
- 043 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走出去”战略
- 049 论文化体制改革
- 068 区域文化产业战略与空间布局原则
- 092 我国文化产业战略力量的发展方向
- 118 论文化产业的公共责任
- 133 文化民权：国家文化软实力建构的战略性基础与价值取向
- 143 文化产业正义：文化产业发展的历史地理学问题
——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新战略理论的思考
- 168 当前中国文化战略发展的几个问题
- 187 国家文化治理：发展文化产业的新维度
- 197 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可持续协调发展
——兼论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布局的关系

下 篇

- 211 温州 2000—2015 年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研究报告
——温州文化发展升位计划
- 236 郑州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06—2020）
- 334 澳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彩虹计划研究报告

上 篇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

题 记：

本文首次发表于1998年第10期《学术月刊》，1999年1月《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这既是我发表在《学术月刊》上的第一篇文章，也是被《新华文摘》转载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这是受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影响而写下的一篇论文。当时中国的学术界都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予以批评，但我在细读之后却感受到其中极为深刻的战略思想。这一思想反映了美国主流战略界对冷战结束后世界未来走向带有根本性的战略判断。这一判断，将不仅深刻影响美国的国家战略决策，而且也还将深刻影响全球在冷战后战略格局的变动与走向。中国已经开始深入地融入现代世界体系，不可能不受这一战略格局变动的影响。中国如何在这一战略变局中寻求自己的战略主动，将直接影响未来中国发展的战略利益。有鉴于此，我不揣浅陋，没有参与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批评，相反，是以一种积极肯定的态度，思考中国未来的文化发展战略。然而，文章写出来之后，连续投了多家杂志社，均被一纸退稿信打发。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朋友的聚会上遇到上海《学术月刊》的常务副主编夏锦乾先生，席间聊起时下的学术景观，联系本文的遭遇我不禁很有微词。夏先生闻后说：“明天你把大作送给我看看。”如约，第二天下午，我便把打印好的文稿送到夏先生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上海社科院大院里的办公室。夏先生收下文稿说：“明天下午还是这个时候，你来，我们谈谈。”我如约又去了。在夏先生的办公室里坐下，夏先生递给我他修改过后的文稿说：“大作我们来发。我修改了一下，你看看行不行。”《学术月刊》在学界享有崇高学术地位，拙作又经夏先生修改，我从头至尾很认真地读了一遍，连忙点头说：

“好！好！”大有受宠若惊之感。这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篇文章。文章发表后，1999年元旦后不久，夏先生给我打电话：“胡惠林啊，大作被《新华文摘》今年第一期全文转载了！恭喜你啊！”这怎么可能？《新华文摘》在整个学术界的地位除了《中国社会科学》没有能与之比肩的。我将信将疑，但心中激动已是溢于言表，立即骑了自行车到离开我家最近的思南路邮局，把其仅有的4本1999年第1期《新华文摘》全部买下来了，就站在邮局门口寻找《新华文摘》中我的这篇文章。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这篇文章的标题居然上了这一期的封面，我就此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学术生涯。这篇文章坚定了我学术研究转向的信心，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我要特别感谢夏锦乾先生，没有他，我是否还能实现这个转向还真不好说，我在许多地方和场合都提到了这件事，夏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写下这篇题记，一来交代一下这篇文章写作的动机，二来把夏先生的事迹记录在此，以表示我的由衷感谢。

1995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说明》中郑重指出：“能否搞好精神文明建设，关系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我们把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带入21世纪。”这是一个大国的最高决策者审时度势，站在民族兴衰、事业成败和全球发展的高度来指明本国文化建设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意义。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十五大报告用专门的篇章和较长的篇幅论述文化建设问题，不仅为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罕见，而且把文化建设问题纳入今后百年党的基本纲领之中，这对于中华文化的建设与复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因而它是我们思考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文化纲领。